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研究综述

刘光胜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孔子去世后,曾子的地位日益凸显,但长期以来,人们拘泥于《曾子》十篇晚出的说法,对曾子的研究,只是依靠《论语》、《孟子》、《礼记》等文献记载,造成了对曾子思想的严重误读。上博简《内礼》的出土,证明《曾子》十篇晚出的说法不能成立,因此将《曾子》十篇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重新审视曾子的学术思想,纠正学界研究的偏颇,是当前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现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汇集于此,以供参考。

一、《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十八篇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文献有“《曾子》十八篇”,并注“名参,孔子弟子”,这是目前所见《曾子》一书的最早著录。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录有“《曾子》二卷,《目》一卷”。新旧《唐书》、《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山堂考索》等著录“《曾子》二卷”,亡“目一卷”。《直斋书录解題》载《曾子》杨简注二卷。郑樵《通志》卷六十六云:“《曾子》二卷,目一卷。”可能未见原书,只是袭用前人成说。《明史》、《清史稿》的《艺文志》已不再提及《曾子》一书,可证《曾子》十八篇早已残缺。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曰:“今世传《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题曰‘传绍述本’,岂樊宗师欤?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他见到的《曾子》二卷本是唐本,具体篇数是十篇,和《大戴礼记》同。高似孙《子略》卷一说:“凡十篇,自《修身》至《天圆》,已见于《大戴礼》,篇为四十九,为五十八,他又杂见于《小戴礼》,略无少异。”他具体说明了十篇篇名及其在《大戴礼记》中的篇第,可知他见到的宋本《曾子》,已不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的范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都认为《曾子》十篇出于《大戴礼记》。

蒋伯潜《诸子通考》(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30-331页)认为,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所引《曾子》,均与《大戴记》合,《大戴记》之十篇应在《曾子》十八篇中。自唐至宋之二卷十篇本,皆与《大戴记》之十篇同。《汉书》所录之十八篇,亡其八篇,仅存十篇,而此十篇即为大戴录入记中者也。马总《意林》根据庾仲容《子钞》增损而成,而庾仲容为梁朝人。南朝、隋之际出现的两卷本《曾子》和《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已基本无异,这说明《曾子》十八篇很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残缺。

《大戴礼记》保留了“曾子”的篇名,说明《曾子》十篇并不是《大戴礼记》所本有,那么,《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源自何处呢?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叙录》说:“盖曾子之后学者,论撰

其先师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同在《古文记》二百四篇之中,并出于孔氏壁中者也。”他认为《曾子》十篇出自孔壁。孔广森认为《曾子》十篇取自《曾子》书(《大戴礼记补注·序录》)。《曾子》十八篇在南北朝时已残缺,《曾子》十篇是《曾子》十八篇的遗存,后世的《曾子》书靠《大戴礼记》得以保存下来。戴震、王鸣盛、阮元、马国翰、皮锡瑞都赞成这种说法。

二、《曾子》十篇真伪及成书问题

《曾子》十篇为曾参所作,在宋代以前学者并无疑议。自宋代始,学者开始怀疑《曾子》十篇晚出,一是认为《曾子》十篇和《论语》、《孟子》等书所记曾子不同。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说:“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周氏涉笔》说:“《曾子》一书,议道褊迫,又过于《荀子》,盖战国时为其学者所论也。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正指圣境妙处,此书遽谓七十而未坏,虽有后过亦可以免。七十而坏与否,已不置论,而何以为过?何以为免?圣门家法无此语也。”

二是认为语言浅薄,与道家相似。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认为,《曾子》皆世俗委曲之言,曾子说“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进而推论“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清王定安《宗圣志》卷六认为:“其言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颇混于老氏清净之旨。”近代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0页)也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1939年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18-619页),把《曾子》十篇定为伪书。津田左右吉《论语と孔子の思想》(岩波书店1946年版,第65页)认为《曾子》成书在汉代,是以《荀子·大略》为素材而构成的。陈荣捷《初期儒家》(《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4分,1976年)认为《曾子》十篇讲各种道德如敬孝、慈惠、仁义、智忠,是《论语》的本色,但《天圆篇》说到天圆地方,更说幽明、阴阳、神明、龙凤龟火,和第二代儒家的言论绝不相同,恐怕是后起的资料。Jeffrey Riegel(英)鲁惟一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页)认为,《曾子》十篇不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用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

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力辩《曾子》一书不伪。明代宋濂《诸子辨》说:“(《曾子》)‘七十而从心’,进学之序;‘七十免过’,勉人之辞: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讥之,过矣!‘君子爱日’,海学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语有详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辞费诮之,亦何可哉!”清人钱大昕认为,《曾子》十篇,皆古书仅存者(《潜研堂集》卷二十七)。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新刻大戴礼跋》认为,《曾子》是《大戴礼记》中最精粹的篇章,他说“余尝谓此书之极精粹者,《曾子》数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学者所当日三复也。‘博学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为棘人,每诵‘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数语,辄不禁泪之盈眦也。”阮元《曾子十篇注释序》认为,《曾子》的价值与《论语》同,学习儒学应从研习《曾子》始。

关于《曾子》十篇的成书,李云光《曾子学案》(《台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1960年第4期)说:“书中诸语未必系为曾子之意,而其思想渊源必由曾子也。”熊公哲《曾子在孔门》(《孔孟

学报》第14期,1967年)认为,《曾子》十篇记乐正子春下堂伤足之事,据此《曾子》十篇应是曾子之意,乐正子春门徒所传。王铁《〈曾子〉著作时代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从文体、语言、文献引述等方面考察了《曾子》十篇,认为它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推测《曾子》是由曾子第二、三代弟子缀辑他的遗言、遗文而成,时间在战国前期。董治安《论曾子——关于历史上的曾子和曾子的历史评价》(《文史哲》1993年第1期)也有同样看法。

武内义雄《曾子考》(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认为,《吕氏春秋》引曾子语有五段,三段与《曾子》十篇符合,可知《大戴礼》“曾子十篇”是汉十八篇的一部分,为研究曾子最有力的资料。黄开国《论儒家的孝道学派——兼论儒家孝道派与孝治派的区别》(《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曾子》十篇是由曾子后学不同的学派编订的,《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四篇,出自孝道派弟子之手,《立事》、《制言》、《疾病》、《天圆》四篇,与孝道派没有关联。

郭店简、上博简的出土,为《曾子》十篇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罗新慧《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认为,《曾子》十篇成书年代和郭店简大致相当。张磊《上海博物馆竹书〈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将上博简《内礼》和《曾子》十篇加以对比,认为《曾子》十篇已接近曾子及其门人生活的年代。

三、《曾子》十篇的辑本与传流

两戴《礼记》成书以后,《礼记》被奉为礼学重典,但《大戴礼记》长期被人冷落,以致残缺过半。《曾子》十篇受《大戴》牵连,在很长时间内无人研究。现存最早的《曾子》注本是北周卢辨注,虽然简略,却使《曾子》已大体可读。清代孔广森说“(卢辨注)起汉氏之坠学,绍涿郡之家绪”(《大戴礼记补注·序录》),甚为允当。

唐代魏征《群书治要》节录《曾子》四篇,马总《意林》摘录《曾子》二卷,是研究《曾子》传流的重要资料。宋元时期,学者主要是以《曾子》十篇为底本,杂采他书,以期恢复《曾子》书的原貌。晁公武深感《曾子》文字“回舛谬误”,以家藏《曾子》与司马光所藏《大戴》参校,颇有是正。《直斋书录题解》记载《曾子》杨简注二卷,今已不存。刘清之《曾子》分为内、外、杂七篇,周遏著《古曾子》十篇,徐达左著《传道四子书》,其中《曾子》两卷,分内、外十四篇,周遏编《古曾子》十篇,皆见于吴澄《吴文正集》。王圻《续文献通考》著录章樵《集曾子》十八篇、戴良齐《曾子遗书》二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赵汝腾《曾子》二卷,可惜这些书今天大都亡佚。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辑本是汪晔《曾子全书》,汪晔以《孝经》、《大学》为内篇,把先秦两汉典籍中与曾子有关的事迹、传说汇集起来,加以选择,定为外篇。缺点在于别为标目、割裂经文,致使文义乖隔(《四库提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有对《曾子事父母》单篇注解。

明清时期,《曾子》十篇受到空前的重视,陶宗仪《节录曾子》前有晁公武《志》语及十篇篇目,后节录原文20余条。吴世济删节《大戴礼记》,编订《曾子》六篇,任兆麟《述记》著录《曾子章句》一卷,《诸子文粹续编》收录李宝淦《曾子文粹》,都是对《曾子》书的摘录。冯云鹗编

《圣门十六子书》,内有《曾子书》八卷,《传》一卷,贺瑞麟《西京清麓丛书续编·养正丛编》著录雷柱《曾子点注》两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收录曾承业《曾子全书》三卷、毛奇龄《曾子问讲录》四卷,《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著录顾观光《曾子逸文》,魏源《古微堂集》内有《曾子章句》一卷,这些著作除收录《曾子》十篇外,兼涉曾子遗文、逸事的汇编整理。王定安《曾子家语》广采先秦至汉魏古书,按序排列曾子文献资料,蒋伯潜评价说“其搜辑之广,采录之慎,远在汪焯之上”。在《曾子十二篇读本》基础上,严式诲收集材料,刊行严氏孝义家塾刻本《曾子四种》,编订《重辑曾子遗书》14卷。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著录宋鸣梧《曾子》,晁璩《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续曾子》,钱谦益《绉云楼书目》卷四著录《曾子》,顾宗伊《曲台四书辑注》收录《曾子古本辑注》五卷。阮元说这些传本多是杂采他书,以意编集,非曾子原文。有鉴于此,阮元著《曾子注释》四卷,依据卢辨注,参照卢文弨、戴震、孔广森等人的校本,遇到不妥处,以己意裁断,如《曾子立事》说“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卢辨注:“危害于身。”句意艰涩难通。阮元《曾子注释》:“殆于身之,谓几于身为之耳。”句意豁然开朗。其书“正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异同”,为注解《曾子》十篇的经典书目。邵懿辰《半岩庐所著书》收有《曾子大孝编注》一卷,李宝淦《诸子文粹续编》著录《曾子文粹》,《道古堂集》著录梅文鼎《曾子天圆篇注》一卷,唐文治著《曾子疾病篇讲义》,多为对《曾子》单篇的注释。

学者为《大戴礼记》作注,自然也涉及到对《曾子》十篇的笺释校勘。清人姜兆锡《大戴礼删翼》因《曾子大孝》注在《礼记》,故多有删省,《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圆》旧本无注,故详加笺注,其目的在于删其繁冗,彰显儒学精义。《曾子立孝》:“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说“忠爱,谓中心之爱”,并引郑注《孝经》“敬者,礼之本也”。王聘珍多采用汉人注疏疏解经文,简洁准确,不擅改经文,发蒙解惑,成绩斐然。

《曾子立事》:“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孔广森注曰:“由,古通以为犹字。”孔广森精通训诂之学,《大戴礼记补注》一书多精义,孙诒让以为此书最为善本,当非偶然。《著述集览》著录仁科干《曾子校刊》(1808年版)、田边匡敕《曾子补注》(1822年版),《静嘉堂文库分类书目》著录小岛知足《曾子孔校补正》(1862年版),对《曾子》进行校勘时,多以孔注《曾子》为底本,可见其书影响深远。此外注释《曾子》的还有汪中《大戴礼记正误》、孙诒让《大戴礼记骈补》、汪照《大戴礼记注补》、王树枏《校正孔氏大戴礼记》等。

太仓唐、叶长青《曾子辑佚》(《国专月刊》第2-5期1937年)将历代文献中《曾子》的佚文按时间先后汇集在一起,非常方便学者研究使用。李云光《曾子学案》(《台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1960年第4期)以学案的体例,分文献记载、辑本的种类、真伪考证三个方面,对《曾子》进行了详细考订。杨家骆《清儒礼大戴记著述考》(《大陆杂志》1964年第4期)对明清之际《曾子》十篇的各种辑本有所考辨,只涉及刘宗周、梅文鼎、阮元等数家,惜有所疏漏。祁玉章《曾子集斟》(《孔孟学报》1983年第45期)以《大戴礼记解诂》为底本,仿照阮元的体例,博采众说,参证互校,分篇对有疑难的部分语句进行了校释,创获颇多。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前有题解,后有译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李启谦、王式伦《孔子弟子资料汇编》(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贾庆超《曾子校释》(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将散佚的

曾子资料汇集一起,便于学者研究使用。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13-316页)细致考辨了《曾子》十八篇源流,并对《曾子书》、《曾子十二篇读本》作了简要介绍。吕思勉借助《礼记·祭义》篇,指出《曾子大孝》有两节文字系脱简错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页)。李居平《〈曾子〉文献流传略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刘红霞《〈曾子〉传本考》(《管子学刊》2007年第4期)考察了历代《曾子》文本的流传情况,并对书目著录有误处进行了订正。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版)博采众长,集历代重要注说于一书,是目前最新的两部汇校本,对《曾子》十篇均作了集释,缺点在于未能充分吸收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博简《内礼》公布后,日本学者纷纷转向用《曾子》十篇校勘《内礼》的研究。浅野裕一《新出土资料と诸子百家研究》认为,采取“无资格不可批评他人”形式的《曾子立孝》^b,其论述逻辑远比采取迂回说法的《内礼》^B明快得多,这种露骨的论述逻辑,忌讳适用于父、兄、君等上位者,《曾子立孝》可能是故意省略了有关父、兄、君三者的记述(《中国研究集刊》2005年第38号)。福田哲之《上博简〈内礼〉的文献性质——以与〈大戴礼记〉之〈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比较为中心》(《简帛》第1辑,2006年)认为,上博简《内礼》(一)是《曾子立孝》的原型,但存在两种可能性:在《曾子立孝》原始本子的编撰阶段,以《内礼》(一)这样的正文为素材而加以改变,第二种可能性是《曾子立孝》成型后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加以改变,形成现在的《曾子立孝》正文。井上亘《上博楚简〈内礼〉与孟子思想》(《儒林》第3辑,2006年)认为,上博简《内礼》接近《曾子》的原形,今本《曾子》并非有意改变,是由于在传写过程中发生了文字异同、脱编、错简、误写等,遂使文句不通,不得已改编了语句。

四、《曾子》十篇与曾子思想

民国期间,孔教运动兴起,曾子研究是当时孔子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者受疑古思潮影响,视《曾子》十篇为伪书,使《曾子》十篇研究出现了严重的偏颇。刘通《曾子序》(《国专月刊》1937年第6期)认为,曾子性善说远比性无善无恶与性恶说精当,使孔子思想圆密精微者,非曾子莫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42-143页)说曾子的著作已荡然无存,只好从《礼记》、《孝经》里面采取一些勉强可用的材料。胡理兹《孔门弟子的思想》(《说文月刊》第3卷第2、3期,1941年)研究曾子的思想,亦不用《曾子》十篇作为材料。

建国以后,《曾子》十篇伪书说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等著作研究曾子不依据《曾子》十篇,只靠《论语》、《孟子》、《礼记》,造成了对曾子思想的严重误读。王铁、黄开国、刘建国等奋起纠正这一偏颇,由于没有坚强的文献证据,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店简、上博简相继面世,从根本上纠正了《曾子》十篇晚出的错误认识,《曾子》十篇研究重新焕发了生机。

对于“仁”和“孝”的关系,周予同《“孝”与“生殖器崇拜”》(《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认为,曾子一派之所以把孝泛化,使它的概念外延与仁相等,

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其后,曾立仁《曾子学述》(《华国》1958年第2期)结合《曾子》十篇等材料,从孝、忠恕、修省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子的思想,条理井然,但在运用《孝经》作论证材料时不够谨慎。曾彩垂《曾子践仁之规模》(《人生》1961年第10期)认为曾子对仁德践履,基本是遵循孔子的指示途径的,虽然规模小于孔子,但却便于操作和践履。罗新慧《试论曾子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认为,曾子对于“仁”、“礼”进行了重新思考,是为了让尽量多的人能够理解和实行。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年)、张倩《试论曾子对孔子学说的阐发》(《燕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也有类似看法。李炳海《身病而神清的孔门师徒——孔子、曾子患病时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识》(《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认为,曾子把孝归结为形全身安,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学界从不同层面对曾子孝道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宇野哲人《支那哲学の研究》(大同书店大正九年版,第126-130页)认为,曾子的孝可以分为服从、养志、爱敬、几谏等四个方面,曾子致力于忠和孝的沟通,强调忠、信、敬等皆是孝的表征,其形而上的意义比孔子明显增强了。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仰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1页)认为,曾子的孝不为时间和空间限制,是遍布宇宙的原理。曾子所说的孝,与孝弟并称的“孝”不同,实是近于孔子底仁。行孝的方法,主观上从忠,客观上从礼,这和《论语》中仁的方法——教以忠恕与复礼很相似。

姚振黎《曾子志行考述》(《孔孟月刊》1984年第10期)从孝道之实践与发扬、志节与大勇、守约与全归、忠恕与权变四个方面探讨了曾子的孝道思想,认为曾子学主躬行,持之以弘毅,功夫切实,已臻成己成物、立人达人之境。卓秀严《曾子论孝》(《成功大学学报》第22卷1987年)认为,曾子之忠敬是发于内心之至诚,礼为形诸外貌之恭敬,内外兼修,是曾子之孝的特点。加地伸行《论儒教》(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44-45页)以《曾子大孝》乐正子春伤足为例,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的遗体,父母的身体也是祖父母的遗体,如果追溯上去,就意味着自己肩负着过去的一切,主张从生命论的角度对曾子的孝道进行考察。池泽优《“孝”思想の宗教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294-295页)认为,父子之间的爱 and 顺从的伦理,是人情的自然,曾子理论的意义在于使父子之间的伦理通往普遍的伦理。

对于曾子孝道思想历史作用,学者作了细致的探究。陈立夫《宗圣曾子对于宏扬圣学的贡献》(《孔孟月刊》1977年第1期)注重曾子在孔门之地位及其在儒学传承中的功绩,将《论语》、《孟子》、《孝经》、《曾子》十篇均作为研究曾子的材料。华仲麟《孔门道统之传——颜、曾、思、孟、荀》(《儒家思想研究论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6-7页)认为,曾子是孔门孝道的典型,驾乎闵子之上,而且标举出忠恕,独传孔子一贯之道。罗新慧《曾子与〈孝经〉——儒家孝道理论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认为,曾子将忠君与孝道融汇的理论适应了家族势力和个体小农家庭上升的社会趋势。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6-707页)说曾子身体力行孝道,将孝道分为以敬孝亲、竭力养亲、爱身孝亲、从道微谏、遵守父道、慎终追远等具体层面,曾子的孝道哲学是他对诸子批评的回应。

何元国《〈曾子〉泛化孝再评价》(《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认为,《曾子大孝》对孝

作了教条的、片面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的精神,露出了“愚孝”的苗头。相关研究还有曾振宇《曾子思想体系论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李启谦《曾子研究》(《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张践《先秦孝道观的发展》(《中国哲学》第22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钟肇鹏《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版)、贾继海《曾子对孔子孝道观的继承》(《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王长坤《先秦儒家孝道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等。

吕思勉《经子解题》(商务印书馆,1926年)把《曾子天圆》篇的主旨归结为“论万有皆成于阴阳二力,万法皆本于阴阳”。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491页)认为,曾子的阴阳学说是有所来源的,是进一步修正医和等人的说法而成,曾子以阴阳二气为“仁义礼乐之祖”,后经子思、孟子进一步发展,成为荀子所批判的五行思想。相关研究还有周海生《〈曾子天圆〉与曾子的自然观》(黄怀信等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刘信芳《〈太一生水〉与〈曾子天圆〉的宇宙论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张宏轩《〈曾子天圆〉的“品物之本”论及其思想渊源》(《管子学刊》2005年第4期)等。

金德建《〈曾子天圆〉的述作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曾子天圆》篇立论的根据在《易经》,其内容“沾染于易学颇深”,其许多论述与《易》之《说卦》、《文言》、《系辞》、《彖传》等有关。罗新慧《曾子思想与阴阳学》(《管子学刊》1996年第3期)认为,曾子是一位善《易》者,他的阴阳学说是易学发展的里程碑。高新民《〈周易·象传〉与曾子》(《青海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注意到《曾子》十篇和《易传》文体上有相似性,推断《象传》为曾子所作。

《曾子》十篇研究的新趋势。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激活是双向的,由上博简《内礼》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的相似性,可证《曾子》十篇并非晚出,反过来,也可据《曾子》十篇加深对《内礼》简文句意的理解。叶国良《郭店儒家著作的学术谱系问题》(《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第13期)从传世古籍入手,考证曾子、子思存在传承关系,再从思想、用词、内容等方面确定郭店儒简均属曾子、子思一系的篇章。廖名春《楚竹书〈内礼〉、〈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叶国良等编《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初集》,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65-287页)将《曾子立孝》和上博简《内礼》进行了比照,他认为《内礼》所说的爱与礼,不是下对上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爱互敬。郭梨华《曾子与郭店儒简的身体哲学探究》(《政大中文学报》2005年第3期)将曾子和郭店儒简作者的身体观作以对比,认为孔子、曾子是先秦儒家身体观的奠基者。林素清《“释匱”兼及〈内礼〉新释与重编》(载《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结合《曾子》十篇,对《内礼》编连和“匱”字释读提出了新见。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页)认为,“内礼”作为篇题,是说孝既要有内心的忠爱之情,还要有外在的礼节形式,它实际是对该篇首句“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的概括和总结。相关成果可参看杨朝明《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王巧生《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内豊〉篇集释》(《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可以肯定地说,《曾子》十篇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将是今后曾子研究的重要趋向。